

# 林 凌 选 集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

山西经济出版社

F12-52/2  
11318715

# 林凌选集



徐州师大图书馆



22727572

8715

山西经济出版社

---

**书 名: 林凌选集**

---

**作 者:** 林 凌 著**出版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69号·  
邮码:030001·电话:4044102)**发行者:** 山西经济出版社**印刷者:**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 1/32**印 张:** 28.625**字 数:** 717千字**印 数:** 0001—1000册**版 次:**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636-089-1/F·088**定 价:** 45.00元

---

**责任编辑:** 郭立群 **复 审:** 宋晋平 **终 审:** 张凤山

## 个人简历

林凌，1926年2月16日生于山西省平定县。194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读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后转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工作。北京解放后担任石景山钢铁厂（今首都钢铁公司）工会副主席，从此与经济工作结缘。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重庆钢铁公司、中共四川省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任职，从事企业管理、工业经济管理和三线建设、区域经济管理、经济政策研究、经济理论研究和刊物编辑、文字写作等工作。1978年6月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转入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1983年后任国家体改委兼职委员。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武汉和重庆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导报》、《区域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著述和主编的研究成果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论》、《四川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评估》、《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中国21世纪经济格局展望》等。在企业改革、中心城市综合改革、宏观管理改革、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有突出贡献，曾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

一等奖、二等奖，有几项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为国务院总理和四川省领导采纳实施。1988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9年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1994年被评为四川省“十大英才”之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林凌自序

1978年5月我工作的机关——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派我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去四川西昌和攀枝花地区调查讲学。冶方同志因在60年代同意前苏联学者利别尔曼关于企业要讲求利润的主张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闻名。当时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交政治部工作，自然关注这位大学者的命运。一听说要我陪他去讲学，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冶方同志学识渊博，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更难得的是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尽管60年代就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住了7年监狱，但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丝毫未减，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我陪他从成都出发，经西昌、昭觉、攀枝花到昆明、西双版纳，然后经过成都返回北京。除听他的学术报告外，一路上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和学术思想。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他的那份《社会主义经济论纲》的提纲。早在60年代他就决定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著，并拟就了上述这份提纲。但不久就被剥夺了自由。在监狱里，他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写作，但又没有条件，就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和默念这份提纲的细节，共达83遍之多，在给我讲述时，简直是“倒背如流”。我不但为他的这种为学术研究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而且从他的学术思想中受到极大的教育。

和启发。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企业独立核算和讲求利润的理论，对企业“复制古董”式的折旧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斯大林一些理论观点的质疑等，真有震聋发聩之感，对我后来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从党委机关到理论研究部门，对我来说，无异是半路出家。我是学物理的，后来转入经济领域工作，多半时间是研究经济政策；也曾下功夫学习研究过经济理论，但不系统。在我工作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建时研究人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二是非本专业出身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三是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但没有大学学历的理论工作者。人们戏称这三类人为正规军、杂牌军、土八路，我是被列在杂牌军之列的。但可以自慰的是，我经历过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经济变革：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在工厂参加了民主改革，在废除国民党时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以原苏联为模式的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有过亲身的经历；50年代末，我作为重钢转炉炼钢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又在四川省委机关工作，深深卷入了“大跃进”的洪流，尝过兴奋而又苦涩的滋味；60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全心身地投入过三年经济调整工作，从制定企业管理条例，改进人民公社体制，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总结反思，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60年代中，我满怀激情参加了蔚为壮观的大三线建设，在宏观方针政策的制定，大工厂厂址的选择，铁路建设、工厂建设经验的总结推广，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政策的推进，都有我的踪迹；60年代末到70年代，文化大革命象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劈头盖脑地向党政机关袭来，我作为西南局一位领导的临时秘书，陪他到处接受批斗，过去认为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那时都错了，过去认为错的那时都对了，彷徨、苦闷，迫使我如饥似渴地去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反杜林论》、《资本论》、

《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和毛泽东未发表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等我都反复阅读和琢磨过。70年代中，我被恢复工作，再次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搞政策研究。我参加了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经济工作的整顿，使我看到了曙光，但不久又破灭了。

我的以上这些经历，使我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些结论产生了怀疑，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危害有了切肤之痛，对党所推行的某些政策造成的失误有亲临其境的感受，因此，一旦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而又给了我一个直接参与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变革的机遇，我像又回到了读大学时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和50年代初与工人一起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那些个激情满怀、奋不顾身的年代，立志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

我的经历使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走上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熟悉工厂，了解工业，也了解农业和商业，计划、基建、财政、税收、劳动工资、物资、银行等我都接触过。当1978年下半年四川率先在全国进行企业改革试点时，我就和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一起，一头钻进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国有企业如何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去了。当时我就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源泉在企业；要解放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首先应解放企业的生产力。这就是我至今仍然致力于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由于学术观点、思想作风和研究方法的一致，我和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同志在改革中结识，后来又成了莫逆之交。1982年3月，我带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首钢，同一苇同志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共同进行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小企业有机构成低，在生产诸要素中，人的因素起的作用大，可以

扩大自主权；大型企业有机构成高，物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不宜扩大自主权，因此，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就形成一个“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的说法。我们两人都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企业无论大小，有机构成无论高低，人在生产中总是起主导作用。企业规模大，有机构成高，活动的余地和可以发掘的潜力就更大，给大企业以必要的自主权，使大企业有更大的活力，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在首钢工作了40天，最后根据上述观点，结合首钢的实际，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在首钢进行“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报告。我们的报告很快就被批准，因为解决了一个困扰人们的大型企业能不能扩权和如何扩权的大问题，心里非常高兴。

在写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我们还提出一个可否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当时不过是一个附带的提议，但也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令人振奋；于是我们又联袂奔赴重庆对综合改革试点的可行性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于同年11月5日写出了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另一份报告：《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这个建议不但得到批准，而且以党中央的文件形式下发，并由薄老主持，带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会同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近200人，在重庆进行了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从此开始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我们参加了这项改革的实践，深感欣慰。

我们所以提出上述建议，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绝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必须有中心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改革相配套；而传统体制中，同在一个中心城市的企业都分别隶属于中央各部、省各厅、市各局和区各局，如不相应进行城市的综合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很难进行；二是中心城市都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有的还是全国的经

济中心。传统体制把本来就应当是开放性的中心城市封闭起来,被当作一个一般的行政区来管理,严重制约了它的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我们的建议就是要通过重庆综合改革试点,探索一条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路子。

在以上两项重大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城市改革的研究;同时参与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又介入了宏观改革的研究;对企业改革逐步转到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上。1983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开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孙冶方同志不幸逝世。由我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牵头,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4年和1986年我的两篇关于城市改革的论文连续获得这个殊荣。我想起1978年他对我谆谆教诲,这两篇获奖文章应当看作是对他的教导的报答吧!

1988年5月我大病初愈,应《求是》杂志记者之约,在北京住院康复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承包制只是企业改革的一种过渡模式,股份制才是最终模式;而且我发现,二者不是对立的,承包制中已孕育着股份制的胚胎,从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是完全可行的。对股份经济的属性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并认为混合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这篇文章于《求是》1988年第14期上发表,有几家杂志转载,还被收入了一本股份制的论文集。使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一年后的1989年“六四”事件后,《求是》杂志,也是第14期,发表了一位同志与我的这篇论文商榷的文章,点名道姓达20余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四川的舆论认为要对我进行批判了,港台报刊也借机大作文章。有一本名为《潮流》的香港杂志借题发挥,竟用了近四千字的篇幅来介绍我的经历和改革开放年代的活动,煞有介事地说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在遭受批判,我就是例子。我跑到北京去找《求是》的秘书长刘复荣同志,又找到总

编辑苏星同志，他们讲并没有批判我的意思，要我再写一篇文章在《求是》上发表，以正视听。我的文章在《求是》1989年10月的1期上刊登出来，这件事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治理整顿时期我最担心的是改革发生曲折反复。当时有位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观还是资本主义改革观的问题。我当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观的理解却与这位学者有些不同。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巡发表的重要谈话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和鼓舞。同年4月我在武汉的一次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的发言，从八个方面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阐明了我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八个方面是：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消除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障碍；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服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拥护；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倾向性问题，不要随便贴标签，扣帽子；必须坚持反丑恶、反腐败斗争，警惕出现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贿赂经济；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坚持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去领导改革开放；必须十分讲究政策策略，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我们一道进行改革开放，防止把群众推到改革的对立面。我的这个发言曾广为流传，又在几个杂志上刊登，并被收入几本论文集。这些观点，我至今坚持不悔。

1992年9月，我由深圳到大连，为中国石化总公司一个研讨班讲课。一到住地就接到蒋一苇同志的电话，要我代他去日本参加国际经营学会东京大会，那时他已卧床数月不能亲赴东瀛了。一苇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会长，我是副会长，代他出席本无不可，但看到他那越来越憔悴的病躯，心情十分沉重。我从东京回来，就和一些同志商议举办蒋一苇学术观点研讨会的事。一

苇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马洪、刘国光等同志积极支持召开这个会议，周叔莲同志和我就分别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共同发起。开会那天，吕东、袁宝华、马洪、高尚全、刘国光、陈清泰等负责同志和学术界、新闻界的专家对一苇同志的学术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事业的积极开拓者。不幸的是，会后仅两个月的时间，一苇就与世长辞了。人总是要死的。对一苇的逝世我很悲痛，但更伤心的是一苇自己，经历了几十年坎坷生涯的他，才遇到一个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遇，而给他的时间却那么短暂，他怎能不深深地感到遗憾呢！我至今还没有写出什么纪念他的文字，唯一的就是我在蒋一苇学术观点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蒋一苇同志〈三论〉观点述评》。我在这篇文章中力图抓住每一论的核心和三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理出一个作者的学术体系来。我做得如何，一苇生前已无力作出评论。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和一些同志以及他的学生们已经组建起一个“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理事会，他的学术思想一定会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9年，我应马洪、李灏同志之邀，同蒋一苇、高尚全、纪中等同志一起，去深圳筹建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把研究院的性质定为民间性、自主性、综合性、开放性和公益性。目的是想学习国外“脑库”的经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研究机构的道路。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为人、财、“屋”奔波，另一方面探索研究的新路，确实费了不少精力。在研究方面，我把精力主要倾注在沿海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战略研究上。如深圳与香港经济对接的研究，在大连构筑“北方香港”的研究，在广西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

区”的研究，北疆五省区对原苏东国家对外贸易的研究，内蒙古中部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以后又发展到研究祖国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经济要从研究中国版图内的经济出发，因此中国经济应分成三个板块（港澳台板块、东部沿海板块、内陆板块）和四股力量（港澳台力量、沿海力量、沿边力量和内陆力量）。去年我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主编了一本定名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的书，我撰写了其中的总论编，算是我这些年研究东部地区问题的一个成果吧。我熟悉西部，又在东部沿海工作了几年，在研究中自然会涉及到东西部关系问题。80年代中我研究这个问题多是从西部的角度出发，现在的研究角度有了一些变化，看问题自己觉得更全面了一些。不久前我写的《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和改革对策》一文，表达了我的一些新的看法。在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对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问题的研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在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改革、企业集团和国有小企业改革上作过一些调查、写过一些文章、出版过有关著作。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不能再拖下去了。而要改革国有企业，政府改革必须与之相配套。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同时政府也是改革的对象，因为我国的政府无论职能、机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的；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方面都必须要改，因此政府又是被改革者。我国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没有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的推动，改革根本无法进行；但因为改革要涉及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弄得不好，政府也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政府必须自觉革命。

现在我还在为中国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尽力工作着，为培养年轻一代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学子而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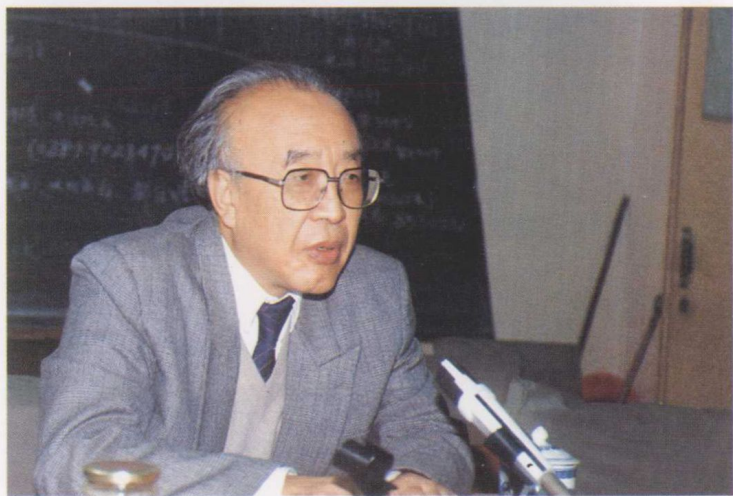
自己的职责。我坚信，中国不管发生什么风浪，由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发展下去，不可逆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林凌近影



1993年3月10日在香港访问时留影



1994年在成都作学术报告

其中，政府这个舵手是主导航，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我国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制度~~政府职能不  
 转变，对企业改革不积极，不协调，不配合，  
 企业再有~~任何~~本领，改革~~也~~难以推进。在我国  
 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因为我国改革是社会主义~~  
 它~~体现~~别~~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政府也是被  
 改革的对象，因为我国的政府无论职能、机构  
 、工作方法等，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之上的，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些方面都必~~须~~改革，因此政府不是改革的~~被~~  
~~对象~~我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没有从中央  
 政府到乡政府的推动，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  
 大的改革成就；但也不因为如此，如果等待不  
 好，政府也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因此，政  
 府必须具有~~自~~革命的自觉性，主动地推进自我